

DANGSHI
XIANCHANG

罗平汉 著

延安时期

党史现场②

如果说上述工作都是延安整风的准备，那么，1941年9月至10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苏维埃运动后期路线问题的讨论，可以说是启动整风运动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这次政治局会议召开的具体时间是9月10日至10月22日，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党的历史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前文提及，1940年12月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曾指出苏维埃运动后期错误是路线错误的问题，但会议没有形成共识。会后毛泽东也没有坚持路线错误的说法。进入1941年，毛泽东在应对国内外事变复杂局面的同时，进一步意识到肃清党内主观主义的必要性，明确提出要“改造我们的学习”，要求全党加强党性并重视调查研究工作，充分认识主观主义的危害。同时，他在接手编辑“党书”的过程中，阅读大量党的历史文献，进一步意识到苏维埃运动后期，中共临时中央及其领导人不但犯错了“左”倾错误的路线，而是形成一条系统的错误路线，在这个问题上如果全党特别是党内领导层不汲取教训，就不能从根本上纠正到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倾向并加以彻底肃清。这是毛泽东下决心在这次会议上重点讨论苏维埃运动后期路线问题的背景原因。

出席这次会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任弼时、陈云（陈云当时未到）、王明（陈云未到）、朱德、陈云、王稼祥、凯丰（何克全）、博古（秦邦宪）、邓发、康生，另有政治局委员周恩来在重庆，刘少奇、彭德怀分别在华中和华北抗日前线，没有出席会议；不是政治局委员的李富春、杨尚昆、罗伯（李富春）、陈伯达、高岗、林伯渠、叶剑英、王若飞和彭真列席了会议，所以这是一次扩大的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原计划开一个多月，但实际上只开了三次会，分别于9月10日、11日、12日、29日和10月22日。

9月10日的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毛泽东说：“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错误路线”都是主观主义。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结果更悲惨。这是因为这些主观主义又分为“国际路线”，即“马恩列斯主义”，即“马恩列斯主义”；“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上，实际上不能起任何作用，但在思想上主观主义的毒害仍然存在。”“六中全会对主观主义作了斗争，但有一部分同志还有在着主观主义，主要表现在错误的各种工作中，在延安的整风中，文化人中，都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这种主观主义同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是相对立的。”“现在，延安的党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仍然存在。”

在讲话中列举了反对主观主义的方法，如“要认识主观主义的严重性”；“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与马克思主义化”；“对于理论要实际的人，我赞成他讲‘理论’”；“理论要性，不能从决定，理论的现象，理论要性”；“要党内斗争路线的斗争，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要开一个动员大会，中央政治局全体出席，大家自由讲话，集中力量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等。最后，毛泽东强调：“打倒两个主义，把人人留下，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有错误的干部要全部保留下来。”“所毛泽东的路线是，首先发言的是张闻天。他说，毛主席的报告，对党的路线的彻底转变有极大的意义。过去我们的路线运动后期的错误没有清算，这是党的主要，现在必须纠正。我如现在做了领导工作而过去没有做过实际工作，也要补课。”

又谈了反对主观主义，要作彻底的清算，不要怕自己的错误，不要怕自己的错误给别人犯着。过去国际把我们一抵没有做过实际工作，就提到中央机关来，是一个很大的损失，过去没有做实际工作，缺乏实际经验，现在要补课，过去的老账，也要还。

讲话是博古。他说，1932年至1935年的错误，我是主要的负责人。遵义会议时，博古说：“我如现在做了领导工作而过去没有做过实际工作，也要补课。”“我如现在做了领导工作而过去没有做过实际工作，也要补课。”“我如现在做了领导工作而过去没有做过实际工作，也要补课。”

博古说：“我如现在做了领导工作而过去没有做过实际工作，也要补课。”“我如现在做了领导工作而过去没有做过实际工作，也要补课。”“我如现在做了领导工作而过去没有做过实际工作，也要补课。”

博古说：“我如现在做了领导工作而过去没有做过实际工作，也要补课。”“我如现在做了领导工作而过去没有做过实际工作，也要补课。”“我如现在做了领导工作而过去没有做过实际工作，也要补课。”

文以教条主义。”
主观主义的来源是
经验不丰富和教条主
主观主义还在发育
思想问题成为政
主要任务，今后政
思想领导为中心。
去的思想方法论：
唯物论——在政治
主义，组织上是家
2. 主观主义——是
哲学思想，政治上
机会主义，组织
主义；3. 唯物论
过去中国党毛主
唯物论，在自以
志代表了唯物辩证
主观主义的传统很
生的根源，除由于
原因外，就是经验
了一些理论而没有
实践的人，是经验
从莫斯科国际回来
工作经验的人，更
主义者；实际工作
人，不易做教条主
容易成为经验主义
国际部长的职权是
是也还须提关于国
军事预算及人物
多提息长是承国民
的指令领袖全国
是不受行政首长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人民出版社

DANGSHI
XIANCHANG

罗平汉 著

党史现场②

延安时期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人民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 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党史现场②：延安时期/罗平汉著.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3.5
ISBN 978-7-211-06709-1

I. ①党… II. ①罗… III. ①中国共产党—党史—1935~1948 IV. ①D2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79556 号

党史现场②：延安时期

DANGSHI XIANCHANG YANAN SHIQI

作 者：罗平汉

责任编辑：林俊杰

出版发行：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人民出版社

电 话：0591-87533169(发行部)

网 址：<http://www.fjpph.com>

电子邮箱：fjpph7211@126.com

地 址：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政编码：350001

经 销：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福建省天一屏山印务有限公司

地 址：福州市闽侯镇永丰村

邮政编码：350101

开 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16.75

字 数：249 千字

版 次：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211-06709-1

定 价：3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与三月会议/001

一、毛泽东、张闻天对右倾的警惕与王明回国/001

1. “必须坚决地反对投降主义” /001
2. “统一战线本身就包含右倾危险” /006
3. “马克思给我们送来了天兵天将” /011

二、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018

1. 王明：“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 /018
2. 毛泽东：十二月会议“我是孤立的” /029
3. 十二月会议所产生的影响 /040

三、193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051

1. 十二月会议之后的王明 /051
2. 长江局提议召开政治局会议 /059
3. 三月政治局会议所讨论的问题 /063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历史地位/075

一、六届六中全会召开的背景/075

1. 延安与长江局的分歧（一） /075
2. 延安与长江局的分歧（二） /081
3. 任弼时在共产国际的报告 /086

二、全会的召开与毛泽东的政治报告/093

1. 六中全会的前奏：九月政治局会议 /093
2. 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 /100
3. 毛泽东作政治报告论新阶段 /106

三、毛泽东领袖地位的完全确立 /112

1. 张闻天的组织报告与王明等人的发言/112
2. “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不对的”/119
3. “党有了群众信仰的领袖”/126

延安整风是如何发动起来的/133

一、整风运动的动因/133

1. 延安干部教育中的教条主义/133
2. 毛泽东决心总结党的历史/137
3. “改造我们的学习”/142

二、整风运动的准备/146

1. 中共中央作出增强党性的决定/146
2. “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148
3.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51

三、九月政治局会议与延安整风的启动/156

1. 九月政治局会议的召开/156
2. 王明发言“揭穿”一个秘密/163
3. 王稼祥、任弼时发言打破了王明幻想/169
4. 整风运动由高级干部发展到全党/179

中共七大：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194

一、七大的筹备与中共六届七中全会/194

1. 中共中央多次决定召开七大/194
2. 联合政府成为七大政治报告主题/200
3. 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207

二、中共七大的隆重召开/214

1. 毛泽东纵论七大工作方针/214
2. “建立一个光明的新中国”/217
3. “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221
4. 朱德、刘少奇的报告与周恩来的发言/228

三、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236

1. “选举问题不是个人问题” /236
2. 联合政府：战略目标还是策略手段？ /245
3. 对资本主义认识的变化/250



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与三月会议

1937年12月和1938年2月底至3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两次召开会议，讨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关系等问题。一般的党史著述认为，在这两次政治局会议上，王明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主张，成为抗战初期其右倾错误（或王明右倾投降主义）正式形成的标志。那么，王明在这两次会议上究竟讲了些什么？其右倾具体表现在什么地方？如何看待他与毛泽东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诸问题上的分歧呢？

一、毛泽东、张闻天对右倾的警惕与王明回国

1. “必须坚决地反对投降主义”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驻军奋起抵抗，全民族抗战由此开始。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呼吁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筑起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坚决抵抗日寇的侵略。7月15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中央提交《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实现国共合作和全国人民大团结的三项基本政治纲领，并郑重地向全国人民作出了四项承诺：（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8月18日，蒋介石正式宣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设总指挥，统辖三个师，以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指挥。8月22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布八路军总部所属三个师的番号。

全面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张闻天十分关注如何在统一战线中保持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问题。8月9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中央及各部门负责人会议，讨论平津失陷后的形势与党的任务。张闻天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坚持同国民党合作的方针，发扬其每个进步，批评其动摇与妥协。反对急躁病，不断推动它前进，逼它前进。另一方面，合作并不是投降，反对满足、迁就的投降倾向。”“提出我党独立的积极的主张，提出保障抗战胜利的办法，来号召与团结全国群众，迫使蒋走向我们方面，使我党实际上起指导作用。”^①毛泽东在讲话中也认为，“红军应当实行独立自主的指挥与分散的游击战争。必须保持独立自主的指挥，才能发挥红军的长处，集团的作战是不行的。同时还要估计到特别的情形，防人之心不可无，应有戒心，保障红军之发展扩大。”^②

8月22日至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洛川召开扩大会议。在22日的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关于国共关系问题，毛泽东指出：现在统一战线正在成熟中，但国民党还在限制和破坏我们，我们是继续有原则地让步，即保持党和红军的独立性，要有自由，而采取不决裂的方针。根据大革命失败的教训，“独立性是组织的、政治的独立问题两方面”^③。张闻天在发言中提出，尽管国民党还有令人不满意的地方，但还是要坚持联合他。既要防止“左”的急躁病，要想尽一切办法来推动国民党，使其在日本进攻及全国人民的压力下继续前进；但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右的尾巴主义、投降主义的倾向，要认清中共有保持独立组织和批评的自由。张闻天强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失掉自己的立场，不要轻易相信人家。我们只是在抗战问题上与人家联合，而内部是有矛盾的。”“目前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态度虽有基本转变，但合作还只是初步成功，并没有完全成功，

① 《平津失守后的形势与党的任务》（1937年8月9日），《张闻天文集》第2卷，第336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第12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第46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完全成功还要有相当时期。总之，我们对国民党的态度是：好的赞扬，坏的批评。”^① 24日，张闻天又在会上作了报告，分析当前的政治形势，在谈到有关方针的问题时，他再次指出：“要使大家了解抗战是一个持久的战争，中共应起决定的作用。只有中共在抗战中取得领导权时，抗战胜利才能得到保障，才能使抗战胜利后完成民主共和国的任务！”^②

8月27日，中共中央召开座谈会，重点讨论统一战线问题，而且在讨论中，第一个题目就是在统一战线中，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还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的问题。毛泽东在座谈会上首先发言。他说：无产阶级的政治和组织程度比资产阶级高，所以统一战线由无产阶级提出。在联合抗日的情况下，要把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贯通起来。在统一战线的长期过程中，国民党有计划地从各方面影响和吸引共产党及红军，我们要提高政治警觉性。要使农民与小资产阶级随着我党走。国民党内也有些人动摇于国共两党之间，共产党吸引国民党的条件是存在着的。“两党之间互相吸引的问题，要在斗争中来解决。统一战线建立以后，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在各方面表现出来的就是投降主义倾向，要注意对党内加强教育。”^③

9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讨论中共参加政府的问题。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其主要内容是：“只有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转变为全民的统一战线的政府时，即在今天的国民党政府（甲）接受本党所提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基本内容，依据此内容发布施政纲领时；（乙）在实际行动上已经开始表示实现这一纲领的诚意和努力，并在这方面获得相当成绩时；（丙）容许共产党组织的合法存在，保证共产党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和教育群众的自由时，中共才能去参加。”“在党中央没有决定参加中央政府以前，共产党员一般地不得参加地方政府，

^① 《在洛川会议上的发言》（1937年8月22日），《张闻天文集》第2卷，第339—340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

^② 《在洛川会议上的报告》（1937年8月24日），《张闻天文集》第2卷，第349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893—1949）》，第46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第17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并不得参加中央的及地方的一切附属于政府行政机关的各种行政会议及委员会。这种参加徒然模糊共产党在人民中的面目，延长国民党的独裁政治，（对于）推动统一的民主政府的建立，是有害无利的。”“在原有红军中及一切游击区中，共产党绝对独立领导之保持，是完全必要的，共产党员不许可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任何原则上的动摇。”^①

这次会议的前三天，即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全文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认为“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今日凡为中国国民，但能信奉三民主义而努力救国者，政府当不问其过去如何而咸使其有效忠国家之机会，对于国内任何派别，只要诚意救国，愿在国民革命抗敌御侮之旗帜下，共同奋斗者，政府无不开诚接纳，咸使集中于本党领导之下，而一致努力。中国共产党人既捐弃成见，确认国家独立与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唯望其真诚一致，实践其宣言所举之诸点，更望其在御侮救亡统一指挥之下，人人贡献能力于国家，与全国同胞一致奋斗，以完成革命之使命。”^②这个谈话的发表，实际上是蒋介石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地位，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毛泽东很快对蒋介石的谈话作出回应。9月29日，他写作了《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成立后中国革命的迫切任务》（即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的《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一文），指出：“共产党的这个宣言和蒋介石氏的这个谈话，宣布了两党合作的成立，对于两党联合救国的伟大事业，建立了必要的基础。共产党的宣言，不但将成为两党团结的方针，而且将成为全国人民大团结的根本方针。蒋氏的谈话，承认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指出了团结救国的必要，这是很好的；但是还没有抛弃国民党的自大精神，还没有必要的自我批评，这是我们所不能满意的。但是不论如何，两党的统一战线是宣告成立了。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

①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345—346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② 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编：《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上卷，第401—402页，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

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①

国共合作局面正式形成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一再重申，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9月30日，毛泽东、张闻天致电负责国共谈判的秦邦宪、叶剑英，强调在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时，以集中五分之三、留下五分之二于原地改为保安队为原则，反对国民党提出的全部集中的要求；保安队均须进行政治上的整理，反对投降主义，反对国民党派遣任何人；任何游击队区域，均须中共中央派人亲去传达改编指示，然后集中。^②10月2日，毛泽东与张闻天又致电秦邦宪、叶剑英，令项英来中央讨论南方游击队改编问题，并指出：“南方游击队万不宜集中，项（即项英，引者）在江西的做法上了国民党的当”。^③10月7日，张闻天起草了《关于取消“西救”的错误及处理办法的指示》，指出：“西救（即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引者）的取消是没有原则的”，“取消自己有长期斗争历史的‘西救’，这实是投降主义倾向的具体表现”。“同国民党这批老爷们没有残酷的斗争，没有必要的进攻的行动，它是不会前进的，也不会向我们让步的。”^④

10月13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刘晓等人，强调：“民族资产阶级的影响，在部分左倾领袖及党员中是在增长，主要表现在对于国民党的投降，只知同国民党统一，处处迁就他的要求，而不知同他的错误政策做斗争。”“民族统一战线不但不取消对于国民党的错误政策进行批评与斗争，而且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才能使统一战线充实巩固起来，使之继续前进。只有使国民党感觉到群众对于自己的不满与压迫，才能推动它在各方面的彻底转变。同国民党和平共居，只能延长他的错误政策的寿命。”“应不失时机对国民党的错误政策采取攻势的批评与斗争，主要方向首先是在改组国民党，然后及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63—364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第27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第27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④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上，第506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

于改组政府与改造军队，这不是使国共合作分裂，而是使之更进一步的开展。”^① 10月19日，毛泽东与张闻天致电周恩来、朱德等，提出在山西须坚持与阎锡山合作，不参加任何倒阎阴谋，但原则问题决不让步。^②

11月12日，即上海陷落的当天，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报告指出：“在卢沟桥事变以后，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已经不是‘左’倾关门主义，而转变到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方面了。这主要是因为国民党已经抗日了的缘故。”因此，“必须尖锐地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必须坚决地反对投降主义。”“‘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的说明、实践和坚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③。11月15日，毛泽东在复电周恩来并告朱德、彭德怀等时又指出：“目前山西工作原则是‘在统一战线中进一步执行独立自主’。因为国民党及阎、黄、卫（指阎锡山、黄绍竑、卫立煌，引者）在日寇打击之下，已基本上丧失在山西继续支持的精神与能力。我们须自己作主，减少对于他们的希望与依靠，故‘独立自主’之实行，须比较过去‘进一步’，这是完全必要的。”^④

2. “统一战线本身就包含右倾危险”

那么，毛泽东和张闻天为何在国共合作一开始，就将反右倾投降问题如此严重地提出来呢？

原因之一，在此前的国共谈判过程中，蒋介石始终没有放弃取消或至少削弱共产党力量的目标，这就不能不使毛泽东、张闻天对蒋介石保持高度的戒心。西安事变之后，国共两党就合作事宜进行谈判。1937年2月8日，蒋介石致电其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提出在与周恩来谈判时，“我方最要注意

①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365—366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第32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91、392、394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第38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之一点，不在形式之统一，而在精神实质之统一。一国之中，决不能有性质与精神不同之军队也，简言之，要其共同实行三民主义，不做赤化宣传工作。若在此点同意，则其他当易商量”^①。在随后与国民党代表张冲、顾祝同进行的谈判中，周恩来发现，蒋介石“始终不承认国共合作，而看作红军投降，似无共产党独立地位”，而蒋本人“因为他成功地解决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问题，使红军再陷孤立，因此暗下决心要把‘共党非人伦、不道德的生活，与无国家、反民族的主义’，‘根绝净尽’”^②。当周恩来提出红军改编后人数确定为六七万，编制为四个师，每师三个旅六个团约一万五千人时，蒋介石2月16日指示顾祝同说：“当西安事变前只允编三千人，后拟加为五千人，但五千人之数尚未与之明言也。今则时移情迁，彼既有诚意与好意之表示，中央准编其四团制师之两师，照中央编制，八团兵力已在一万五千人以上之数，不能再多，即可以此为标准，与之切商。其余人数，准由中央为之设法编并与安置，但其各师之参谋长与师内各级之副职，自副师长乃至副排长人员，皆应由中央派充也。”^③实际上拒绝了中共的要求。同一天，蒋介石还在其日记中写道：“考虑大局，决定编共而不容共，抗日而非排日，外交更以独立自主为基础。”^④

1937年2月21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这次全会较大幅度地调整了国民党的政策，确认了和平统一、修改宪法、扩大民主、开放言论、释放政治犯诸原则，间接地接受了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即便如此，国民党仍在重谈取消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政权的老调。会议通过的《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提出要取消红军、取消苏维埃、停止赤化宣传、停止阶级斗争等。用周恩来的话说，“这个东西是双关的，因为红军改了名称，

①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5编（一），第262页，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5年编印。

② 杨奎松：《失去的机会——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第49页，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

③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5编（一），第264页，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5年编印。

④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5编（一），第265页，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5年编印。

也可以说是取消红军，但红军还存在；苏区改了名称，也可以说是取消苏区，但苏区还存在。所谓停止阶级斗争，停止赤化宣传，就是不许我们在国民党统治区有政治活动。那时候一方面和平了，一方面又埋伏了文章”。^①周恩来所说的这个“文章”，就是要取消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政权。所以这个决议案污蔑中共“封建割裂专制残酷之策略，及其以国际组织为背景，而破坏国家统一之行动与宣传，实与建国立人之要旨绝对相反”，“故赤祸之必须根绝，乃为维护吾国家民族至当不易之大道”。^②

在以后的国共谈判中，国民党方面千方百计地限制中共军队的编制与人数，虽然答应红军可以改编为三个师，但又提出每师人数只能是一万人，总数三万人，蒋介石还对周恩来说，不必说与国民党合作，只是与他个人合作，还说共产党说话不算话，希望这次能够改变，能与他永久合作。中共中央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蒋介石知道“共产党不会无条件地拥护他，而他又不能满足于党外合作，故他要我们想新的办法，他认为这一问题如能解决，其他具体问题自可放松一些”。周恩来曾问蒋介石有何具体办法使中共能与他永久合作，蒋却再三说没有，而是要中共方面商量。^③显然，蒋介石想要的办法，就是中共不再是一个独立的、有军队有政权的党，而是共产党溶化到国民党中，维护他的领袖地位。

中共方面“商量”的结果，形成了《民族统一纲领（草案）》，于6月上旬由周恩来携带前往庐山同蒋介石再次进行谈判。不料，蒋见周后，却将这个文件撇在一边，另外提出一个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的主张，“由蒋指定国民党的干部若干人，共产党推出同等数目之干部合组之，蒋为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两党一切对外行动及宣传，统由同盟会讨论决定，然后执行。关于纲领问题，亦由同盟会加以讨论”。“同盟会在进行顺利后，将来视情况

① 《论统一战线》（1945年4月30日），《周恩来选集》，第194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②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第435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

③ 《中共中央关于同蒋介石谈判经过和我党对各方面策略方针向共产国际的报告》，1937年4月5日。

许可扩大为国共两党合组之党”。^①并且在谈判的过程中，蒋介石提出红军改编后三个师以上不能设总司令部，只能设“政治训练处指挥之”，“请毛先生、朱先生出洋”，陕甘宁边区政府由国民党派正的官长，边区自己推举副的，中共派代表参加国民大会时“不以共党名义出席”等。^②蒋介石这些无理要求，中共方面自然无法接受，这次谈判实际上是无果而终。

随后不久，卢沟桥事变发生，周恩来再次前往庐山同蒋介石会谈，并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给蒋介石，而这时蒋的态度却十分冷淡。据周恩来说：“我们带去起草好的宣言，他要动手改两句，那时候我们还客气，同意他修改了两点。但修改了他也不发表，总想把共产党合法这一点抹杀掉。”^③接着，日本在上海制造了“八一三”事变。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才下定抗战的决心，并于9月22日公布《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在事实上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蒋介石的这种态度，无疑促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张闻天等对其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同时也一再提醒各级干部，一定要防止在国共合作实现后发生右倾危险。

原因之二，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国共合作的建立，党内相继发生了若干在国共合作时丧失原则性、迁就国民党的事件，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倾向。其中一个代表性的例子是何鸣事件。

何鸣曾任中共闽粤边特委代理书记、闽粤边红军独立第三团团长等职，坚持了闽粤边的游击战争。1937年2月，何鸣通过国民党报纸了解到已发生西安事变，中共中央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在向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汇报后，于是年5月开始同粤军第一五七师进行停战谈判，并于6月26日达成合作抗日、红军游击队改编为福建省保安独立大队的“六二六政治协定”，较早地开创了局部地区国共合作的新局面。但是，由于何鸣对国共合作的复杂性认识不足，没有执

^① 《中共中央关于同蒋介石第二次谈判情况向共产国际的报告》，1937年6月17日。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1898—1949）》，第361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1898—1949）》，第364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

行南委提出的“驻防地应在我游击区”的指示，将红军游击队带往漳浦县城集中改编，以致发生近千名游击队员被国民党第一五七师缴械的“漳浦事件”（即何鸣事件）。

抗战爆发之后，又相继发生了屈从国民党解散中共领导的群众团体的事件。1937年春，中共陇东特委曾不顾国民党方面的限制，建立各种抗日救亡组织。七七事变后，中共陇东特委的一些人却自动解散这些进步团体。1937年8月，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发出通告，提出要取缔中共所领导的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以及其他进步团体。迫于国民党方面的压力，中共陕西党组织中的一些人，未坚持斗争，于9月间自动解散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要该会的一些干部参加国民党包办的陕西省各界抗敌后援会设计委员会。

原因之三，鉴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教训。中共与国民党曾经有过合作的历史，即1924年至1927年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国共合作固然造成了大革命的高潮，中共的力量及其影响也随之扩大，但这次国共合作给共产党人留下的最深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发动“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致使大批的共产党员及革命群众遭受残酷的屠杀。像毛泽东这样经历过第一次国共合作由兴起到破裂全过程的中共领导人，对于当年陈独秀和共产国际在处理国共关系时，在蒋介石、汪精卫的进逼面前所采取的妥协退让而造成的严重危害，有着深切的感受，因而在毛泽东、张闻天等人看来，要防止大革命失败那样的悲剧重演，与国民党再度合作时，就必须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在国共合作未正式形成前，开展反关门主义的斗争，而在国共合作既已实现之时，就应防止右的倾向，警惕右倾危险。

实际上，在抗战爆发后不久国共合作刚刚实现之时，张闻天、毛泽东就曾对为何“目前投降主义的危险在增长”作了解释。张闻天认为，原因之一是“统一战线愈发展，右倾危险性愈要增长，这是因为统一战线本身就包含右倾危险”。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经验不够，党对于土地革命已有丰富的经验，而对其他斗争方式并不熟悉，而“我们与之建立统一战线的国民党是一个统治全国的党，钱、人、地位都有，它还有相当的经验”，这样，党内一些不健全的分子就可能受其影响；同时，党内“农民成分多，容易受人欺骗与引诱，女人、金钱、地位对有些人诱惑力很大，人家只要一灌

米汤，就轻于相信”，这也是内部容易产生右倾危险的因素之一。^①

毛泽东也就此解释说：“一方面，中国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国民党实力上的优势，国民党三中全会的宣言和决议对于共产党的污蔑和侮辱以及所谓‘停止阶级斗争’的叫嚣，国民党关于‘共产党投降’的衷心愿望和广泛宣传，蒋介石关于统制共产党的企图，国民党对于红军的限制和削弱的政策，国民党对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限制和削弱的政策，国民党七月庐山训练班提出的‘在抗日战争中削弱共产党力量五分之二’的阴谋计划，国民党对共产党干部所施行的升官发财酒色逸乐的引诱，某些小资产阶级急进分子在政治上的投降举动（以章乃器为代表^②），等等情况。”“另一方面，共产党内理论水平的不平衡，许多党员的缺乏北伐战争时期两党合作的经验，党内小资产阶级成分的大量存在，一部分党员对过去艰苦斗争的生活不愿意继续的情绪，统一战线中迁就国民党的无原则倾向的存在，八路军中的新军阀主义倾向的发生，共产党参加国民党政权问题的发生，抗日民主根据地中的迁就倾向的发生，等等情况。”^③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毛泽东、张闻天对国共合作实现后党内可能出现的右倾危险，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3. “马克思给我们送来了天兵天将”

正当毛泽东、张闻天一再强调国共合作中要防止右倾危险之际，长期在共产国际工作的王明，从莫斯科回到了延安，并带回了共产国际关于统一战线的指示与精神。

王明 1931 年 11 月抵达莫斯科后，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在 1933

^① 《右倾投降主义的危险在增长》（1937 年 8 月 27 日），《张闻天文集》第 2 卷，第 350 页，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2 年版。

^② 1937 年 9 月 1 日章乃器发表《少号召多建议》一文，提出：“在国策还未确定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多作政治的号召，使国策能够早点确定下来。在国策已经确定的今日，我们却应该少作政治的号召，多作积极的建议，使国策可以早点充实起来。国家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政府既然已经有确定的国策，有点心肝的人，谁还愿标新立异以鸣高？大家应该是集中力量、培养力量之不遑，那能再存彼此派别之见，在明争暗斗中再消耗一丝一毫的国力。”

^③ 《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1937 年 11 月 12 日），《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392 页，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